

晚明以来张鹤鸣殉难书写的演变

徐 林¹, 高成龙²

(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州 510000)

摘要:张鹤鸣在晚明的政治舞台上饱受争议。就其殉难之事而言,在晚明史籍《司马公殉难事略》、林正亨和吴世济等人的著述里均记载其坚守颍城,城破被执,骂贼而死并受到朝廷表彰。到清代,《颍州方志》和吴伟业、屈大钧等人的著述都继承了晚明史籍的记载,但以邹漪、李邕之、徐秉义为代表的部分东林派史家却认为张氏殉难是因财丧身与忠义无关。究其原因是以徐氏为代表的部分东林派史家将晚明党争中的门户之见带到了修史之中。

关键词:张鹤鸣;颍州;殉难;历史书写;门户之见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25(2023)03-0081-06

张鹤鸣,字元平,号凤皋,颍州人,官至兵部尚书,其为官期间正是明朝政治环境复杂,朝中党派斗争最为焦灼的时期。其一生功绩众多,但也饱受争议,就其殉难之事而言,在晚明史籍《司马公殉难事略》、林正亨的《详奏颍城节烈疏》和吴世济的《太和县御寇始末》等史书多记载,张鹤鸣在地方主官不在任的情况下,捐金募士,率众守城,虽无守城之责,却担起守城之任,城陷被执,骂贼不屈,剥衣倒悬,备受荼毒而亡,受天子赐葬。而在清代以邹漪的《启祯野乘一集》和徐秉义的《明末忠烈纪实》为代表的一些史籍却记载,张鹤鸣在城陷之前行逃匿之举,被家奴出卖被执,因拷问钱财不得被杀,是因财丧身,无关乎忠节。此观点影响了《明史》对此事的记载,在《明史》中提及张鹤鸣殉难有两处:其一,在《明史·张鹤鸣传》中记载其:“崇祯八年,流贼陷颍州,执鹤鸣,倒悬于树,骂贼死,年八十五。”^[1]其二,在《明史·流贼·高迎祥传》中记载:“贼燔寿州,陷颍州,知州尹梦鳌、州判赵士宽战死,杀故尚书张鹤鸣。”^{[1]7952}《明史》中的这两处都选择了省略性记述,均未提及张鹤鸣在颍州防御中的作为,尤其是后者只提及张鹤鸣被杀,并未记载其到底是忠节殉城,还是因财丧身,这就给后人留下了探索的空间。因此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张鹤鸣在颍州陷落过程中是否有所作为以及张鹤鸣殉难两种截然

不同的历史书写形成的过程与原因。

一、颍州陷落与张鹤鸣殉难

明末吏治腐败加上连年的水旱灾害,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各地农民起义频发。崇祯八年(1635)正月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等诸路起义军将领“兵分五路”自河南向凤阳进攻,主力部队进入南直隶州江北地区(即今安徽西北部一带),兵锋直指中都凤阳,颍州位于凤阳之西,是起义军东进的必经之路。据《太和县御寇始末》记载,攻打颍州的当为高迎祥部。“旧县集生员秦培笃,寇稔知是生员,投以纸笔,胁令写‘闯天王’,兴武元年告示。本生坚拒不从,且骂寇贼。”^[2]此处“闯天王”即为高迎祥。

关于颍州失陷的始末,在《张氏族谱·司马公殉难事略》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司马公殉难事略》为张鹤鸣次子张大壮、三子张大庚为上报朝廷奏请恤典所写,详细地记载了颍州失陷和张鹤鸣殉难的经过:

崇祯八年乙亥正月初四日,闻流寇犯汝宁。值赵府尊士宽、尹州尊梦鳌公出,先公舆疾协同乡绅士庶,戒严守城。初七日,获贼奸细,招称贼于十一日至颍,十二日攻城,城中举火内应。

十一日,贼兵数万余骑至,自西南蜂拥城下,揭示伪旨,僭称闯天王,改元兴武。先公策杖,先于士卒乘城捍卫,编子弟入行伍,日夜巡视。其夜果得放火奸

收稿日期:2023-03-16

作者简介:徐 林(1972—),男,辽宁阜新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明代社会史。

细六人,人心稍定。十二日,复有贼兵数万余骑亦至,自西南围城数重,并立攻击,矢石如雨,城中负户而没。无奈城低土薄,人心摇乱,外援不知,内里不支。左右泣语:“城将陷矣,可縋城逃。”先公叱之:“我朝廷大臣也,虽无官守之责,誓当与城共存亡,何逃乎?”至午,西北城陷^[3]。

这与林正亨的《详奏颍城忠节疏》记载相一致。林正亨作为兵科右给事在颍州失陷后奉旨勘察颍州失陷的经过,接到谕旨后,“亲至其地,详察备悉”。在给朝廷的奏疏中,他报告了颍州失陷的经过和概况:

自颍州失陷,奏报之迟,致圣明廑念,命臣速查具奏。臣随亲至其地,详查备悉。初,州官尹梦鳌,通判赵士宽,往府公干。贼信紧急,乡官、原任尚书张鹤鸣与教官周逢泰等,率通城举、贡、士、民同卫所各官,分布守御。初十日,尹知州,赵通判策骑方归。仓促募兵,未集。贼以数万骑,于十一日,落城下北门,外有高楼数座,逼近城垣,外可俯攻,内难仰敌。贼既临城,毁折不及,以致城不能守,缙绅士民骈首就戮^[4]。

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对颍州陷落的记载也是参考了林氏的奏疏,故对此事的记载与林氏颇为一致:

正月初七日,汝宁贼攻颍州。其支贼初八日夜由固始攻霍邱,三日而下。初十日焚寿州之正阳镇。十一日破颍州,屠之。尹梦鳌,赵士宽往府。乡官张鹤鸣,教官周逢泰等,于初七日获奸细,供贼定于十一日至颍。夜举火内应,初十日知州通判策骑方归。仓促募兵未集,贼数万骑,果于诘朝薄城下矣^[5]。

通过对读《司马公殉难事略》《绥寇纪略》《详奏颍城忠节疏》,可以得出颍州失陷详细过程:崇祯八年(1635)正月初四,州官赵世宽与通判尹梦鳌因公外出。在听闻农民军进犯汝宁之后,张鹤鸣同颍州的乡绅士庶,戒严守城。初七抓获奸细,获悉高迎祥部于十一日到达颍州,十二日攻城,城中奸细举火把相应。初十日知州赵世宽与通判尹梦鳌方归,十一日高迎祥部从颍州城西南而至,张鹤鸣编子弟入军,并亲身参与颍州防御。十二日,又有数万农民军至,颍州被围数重,并开始攻城。因城池低矮,城墙太薄,援兵不至,到中午时,颍州城陷。通过研读史料可知,在颍州防御的过程中,张鹤鸣在颍州知府通判不在位的情况下,作为致仕的兵部尚书虽无守土之责,却带领颍州的乡绅士庶,并把族中子弟编入军中,积极参与颍州防御,颍州陷落之后张鹤鸣被执,倍受荼毒最终殉亡。

二、张鹤鸣殉难书写的争议

(一)晚明史籍中的“忠节殉城”

在晚明的史籍中《张氏族谱·司马公殉难事略》、林正亨的《详奏颍城节烈疏》和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均记载张鹤鸣殉难是“忠节殉城”。其中最详细的莫过于《司马公殉难事略》:

至午,西北城陷。左右泣呼曰:“贼入矣,可微服速避。”先公从容语:“我朝廷大臣也,服岂以贼易?死则分也,数也,何避乎?”命左右各散去,衣冠端坐。贼至执之,呼:老汉为谁?先公厉声大骂:“贼奴!我四朝大臣也,八十五岁矣,世受国恩,岂从贼奴?贼奴速杀我!天兵且至,贼奴死不知所,敢以游魂恐我!世有畏流贼张尚书者乎?”贼呼:“老汉跪呼千岁,可不死。”先公益骂:“贼奴!我乃朝廷大臣,膝岂屈贼奴?人皆呼我老爷,汝流寇也,我何呼?呼则流贼。贼奴速杀我,勿多言!世有畏死张尚书者乎?”贼呼:“老汉,欲速死不可得!”遂褫衣,榜掠刺剜,体无完肤,且刑且骂。贼怒更炽,呼:“老汉欲速死,还早。”于是倒悬高竿,箭弩齐发,五兵乱下,骂不绝口。死之日,大星陨,天鼓鸣。百姓吞声而哭者千百人。呜呼!恻心哉!先公之死惨矣^{[3]382-383}!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在颍州将要陷落过程中,左右之人反复劝张鹤鸣逃匿,而其则斥责说:“我朝廷大臣也,虽无官守之责,誓当与城共存亡,何逃乎?”其端坐正堂,而后被执拒不投降,以朝廷大臣自居,叛军劝其投降,其以死明志。而后被叛军脱衣用荆棘鞭打,倒悬高竿,骂贼不止,最后体无完肤被弓箭射死。表现出了其士大夫的气节以及对明王朝的忠贞。其子张大同、其弟张鹤腾、家族之中子弟妻妾俱被害,一家族之中,臣死忠,子死孝,妇女死节,共殉难百余口。但此段史料,张鹤鸣与叛军的对话清晰可闻,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好像记录者就在被害现场,难免让人怀疑史料的真实性。

在林正亨的《详奏颍城节烈疏》中也有关于张鹤鸣殉难的记载:

尚书张鹤鸣,年八十有五,贼拽至北门外民楼下,剥衣倒悬,鹤鸣大骂不屈,贼怒,寸磔之。其长子张大同,年亦六十,为贼所执,撞见父尸,愤骂,贼怒,炙手足,焚须眉,至死犹不绝声。原任副使张鹤腾,年亦八十二岁,贼拽至鼓楼前,大声愤骂,被贼碎脑断头而死^{[4]976-977}。

此记载与《司马公殉难事略》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张鹤鸣被害的方式,《事略》中记载张鹤鸣被执以后,先用荆棘鞭打而后吊于高杆被箭射而死,而此疏则记载,张鹤鸣被处以寸磔之刑。共同点就是,张鹤鸣在被抓之后,对叛军拒不屈服,表现出对明王朝的忠贞,备受荼毒而死。

《太和县御寇始末》是时任太和县知县的吴世济对明崇祯七年(1634)八月至八年(1635)十月凤阳府、颍州、太和县部分往来公文的汇编。其中也有对张鹤鸣殉难的记载,八年三月十九日复查功绩中,“致仕尚书张鹤鸣,年已八十五岁矣,城破之日,家人欲舁之逃。尚书曰:吾受国厚恩,敢惜一死邪?谈笑谩骂。”^{[2]18}此记载与《司马公殉难事略》中的记载相一致。在八年九月初三日申报生擒活寇中记载抓到杀死张鹤鸣的叛军为张判子部下的陈喜童和王寿儿:

有哨马四匹窥城,被先时密遣勇丁李城、李九明等生擒活寇二名:陈喜童,号离山虎,王寿儿,号眇虎,并寇枪一枝。取具口词,委系西音,头目张判子部下,其郎楚府,是渠亲手搦死颍州乡官张尚书^{[2]54}。

太和县的兵丁擒获了杀害张尚书的叛军,经审问张鹤鸣被其“搦”死,“搦”即刺也,此事略中所记载的张鹤鸣被箭射而死有共通之处。

此外,在崇祯十年(1637),皇帝遣中书科中书舍人申腾芳,谕祭原任兵部尚书太子太师张鹤鸣,在诏书中称其:

垂老家居,寇氛骤逼,登城倡义,鼓壮摧锋,援绝捐躯,阖门死难,讣闻轸悼,宠渥宫衔,谕祭式陈,为营兆域,霸其如在,尚克歆承。”又制曰:“惟尔功著折冲,性坚忠义,遂初介寿,寇警忽临,捍御孤城,滨危矢烈,舍生尽节,良用尽伤,载予豆笾归藏,窀穸九原不昧,祇服渥恩。”^[6]

这是明朝廷对张鹤鸣无责守城,忠节殉城的褒奖,亦是对张鹤鸣殉难之事的最终定论。

张大壮、张大庚作为张鹤鸣之子,其所作的《司马公殉难事略》中关于张鹤鸣殉难过程的描写,或许会被人认为有溢美和夸张成分。但林正亨的《详奏颍城节烈疏》和吴世济的《太和县御寇始末》与《司马公殉难事略》相印证,张鹤鸣在颍州失陷前后并未行逃匿之举,而是积极参与颍城的防御,被执之后对叛军行怒骂之举,宁死不降,当家人或者左右劝其逃匿时曰:“吾受国厚恩,敢惜一死邪?”最后被虢衣倒悬,备受荼

毒而死,表现出为国献身的豪气和忠烈之气。

(二)清代史籍中的“因财丧身”

张鹤鸣殉难之事本无可争议,但在清代的史籍中对张鹤鸣殉难之事的记载却存在争议,一部分史书直接接受晚明史书中张鹤鸣“忠节殉城”的说法,亦有部分史家对张鹤鸣殉难之事进行了再建构,认为张鹤鸣殉难是“因财丧身”,无关乎忠节。

在清代的颍州方志中均记载张鹤鸣殉难是忠节殉城,其最早记载在《顺治颍州志》中:

乙亥正月,流寇攻围颍州,鹤鸣以告老大臣,虽事权不属,而捐金募士,背城借一,城陷被执,骂不绝声,备极楚毒而死,年八十五岁。疏闻,诏遣官治葬临祭,以待易名之典^{[6]32}。

此后清代的《颍州志》均采用了此种说法。此外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对张鹤鸣殉难之事的记载为:

(颍)州人,故兵部尚书张鹤鸣,年八十五,贼倒垂诸树,引满射之,鹤鸣嚼齿大骂,有贼刺刃者三,曰:“若能坐而鞭吾背邪。”人始知其边抚时有宿憾,鹤鸣故贵州总督。子大同伏父尸哭被杀。鹤鸣弟副使鹤腾,年八十二,贼拽至鼓楼前,骂贼而死^{[5]80-82}。

此与《司马公殉难事略》和《详奏颍城节烈疏》中的记载相一致。此外,屈大钧的《皇明四朝成仁录》中亦是采用了这种说法。

经考证,关于张鹤鸣“因财丧身”的观点最早出现在邹漪的《启祯野乘一集》中。邹氏将张鹤鸣殉难之事记载在《张太学传》中,邹漪是复社名士吴伟业的学生,但是其对张鹤鸣殉难的书写却与吴氏相反。

公名大同,字同甫,号瑶席,颍州人。原任兵部尚书鹤鸣长子也,为太学生。能文,重声气,与海内诸名士交。乙亥,流寇破颍州城,鹤鸣避匿他所,公居本宅,题门曰:“张大相公书房在此”。贼入,擒之,强之跪,不屈。问其父何在,曰:“要杀便杀,吾父不可得也。”已而,张氏奴导贼,于民舍缚鹤鸣归,拷索藏金,对以无。公曰:“家财悉我所掌,与父无涉。”贼不听,搜其室,见皆古玉陶器。遂劈鹤鸣,顶达踵。公抢头奋臂大骂贼,併欲死之,旁贼劝曰:“既杀其父,姑留其子,但令献金赎命也”。公曰:“父死,义不独生。”骂愈烈,贼先去其须,既复其半面,骂仍不绝声。贼肢解之。

论曰:张司马立朝颇为东林所不与。若太学之慷慨激烈,死忠死孝干蛊多矣^[7]。

此传认为在颍州城陷之后,张鹤鸣避匿他所,后被家奴出卖,叛军拷问其所藏金银财宝,其子张大同说家产由其所掌管,与其父无关,叛军搜其住所,见皆是古玉陶器,于是拔刀将鹤鸣从头顶到脚跟,劈裂而亡。此外在评论中,作者认为张鹤鸣“为东林所不与”,将明末党争的观点带入了其修史之中。此外,李逊之在《三朝野记》^[8]《崇祯朝记事》^[9],计六奇的《明季北略》^[10],汪有典的《史外》^[11]亦是采用了邹氏的观点。

徐秉义的《明末忠烈纪实》,对张鹤鸣“因财丧身”之说具有总结性质的说法,徐氏在修《明末忠烈纪实》时,所采用的史料直接来源就是邹氏的《启祯野乘一集》,有关张鹤鸣记载与邹氏相同,都是将其放在张大同的传记之中进行论述。但是徐秉义在选取史料时并未全部采取邹漪之说,不仅将“旁贼劝曰:‘既杀其父,姑留其子,但令献金赎命也’。公曰:‘父死,义不独生。’骂愈烈,贼先去其须,既复其半面,骂仍不绝声。贼肢解之。”这句话进行删除,更是对邹漪在“论”语中“大司马立朝颇为东林所不与”的观点视而不见。且在按语中对有关张鹤鸣殉难不同的记载进行了评论:

按:…流贼之难,《绥寇》诸书皆言:其年八十五,贼倒垂诸树引满射之。鹤鸣嚼齿大骂,为贼刺刃者三,曰:“若复能坐而鞭吾辈耶?”窃疑其忠义之气与媚奄时若出两人。今据《野乘·张大同传》,贼索其藏财不遂,因而杀之,有哀求而无骂詈。倒悬嚼齿,俱非实录。鹤鸣之死以财丧身,何关忠节?小人病国,老而不死,坐享富贵,天道其假手于贼乎^[12]?

徐氏认为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所记载的张鹤鸣为忠义而死不可信,而认为《启祯野乘一集》中记载的张鹤鸣“因财丧身”为实,认为张鹤鸣在颍州防御的过程中行的是逃匿之举,被家奴出卖后被抓,对叛军行哀求之举,毫无士大夫的气节可言,原因是徐氏认为张鹤鸣曾经“媚奄”,其形象与忠义不符,是天道借“贼手”让其亡,然并无实质性的证据。

三、影响张鹤鸣殉难书写的因素

晚明时期对张鹤鸣殉难之事的书写都认为张鹤鸣在颍州陷落过程中积极参与颍州防御,在城陷之后不屈,备受荼毒而亡,受到朝廷的表彰。明清鼎革之后对张鹤鸣殉难之事却有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是继承了晚明时期的历史书写,二是认为张鹤鸣在颍

州陷落过程中行逃匿之举,且被家奴出卖后因拷问钱财不得而被杀。究其原因,莫过于邹漪所说的“大司马立朝颇为东林所不与”。

清代学者认为张鹤鸣殉难是“因财丧身”的观点源于邹漪,此后计六奇、李逊之、徐秉义、汪有典也是继承他的观点。邹漪是复社中人,与东林名士钱谦益往来密切,李逊之是东林七君子之一李应升的儿子,因其父李应升为东林党人,因此其立场偏向东林。徐秉义是顾炎武的外甥,与其兄徐乾学、其弟徐元文号称“昆山三徐”。而顾炎武又是复社的重要成员,复社又有“小东林”“嗣东林”之称,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故可以称之为“东林后裔”。

张鹤鸣“立朝颇为东林所不与”。李逊之作为东林党后裔,在中张鹤鸣的历史书写中其态度就可见一斑了,其在《崇祯朝记事》中认为:

时各邑乡绅死难者,不能详记。鹤鸣天启初任中樞,左袒辽抚王化贞,与经略熊廷弼构难,致有辽阳之陷。又起奸细一狱,为卸罪移祸地,经抚皆得罪,言路攻之,仅能免官,幸矣。逆奄用事,夤缘起南司空。黔贼未平,逆案李夔龙荐之,逆奄于朝中,大言曰:黔事非鹤鸣不办,虽老可用也。遂改兵部尚书,督川、湖、云、贵军务,赐蟒玉。尚方闻其所以献媚逆奄者,至丑秽不可道。崇祯初,为言路瞿式耜、胡永顺辈论其克饷冒功与媚奄诸罪,削职家居,至是年已八十余矣。熊、王皆相继正法西市,彼独老而不死,安享富贵,乃竟戕于流贼之手,惨毒加甚,谁谓天道无知乎?然继鹤鸣督云贵为朱爌元,又言因其遗略,得平安氏。盖其人大略,有才而忤,贪而鄙,用为督抚,或可收效一隅;用之中樞,不免贻害国事矣^{[9]卷二,63}。

从辽东战事的经抚之争,再到张鹤鸣受到“逆阉”的推荐起用为南京工部尚书,其后又受到“逆党李夔龙”的推荐再度出任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认为其谄媚于“阉党”。且认为王化贞、熊廷弼都已伏法,张鹤鸣却安享富贵,死于流贼是天意所致,论述中带有强烈的党争意气。

徐秉义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编修《明末忠烈纪实》时完全采用了邹漪和李逊之的观点,并将晚明以来关于张鹤鸣殉难书写的观点进行总结,在《张大同传》的按语中,亦带有明末东林党与“阉党”党争的观点。邹氏、徐氏仅凭此就判定张鹤鸣之死是以财丧身,无关乎忠义,是亡于天道,证据并不充分,是意气

之说。其作为东林后裔,在对“政治敌人”进行书写之时难免有不实和诬陷之疑。

此外,朱希祖也认为,徐秉义在修纂《明末忠烈纪实》中抱有强烈的门户之见,认为徐秉义“惟身列慎交社,为东林、复社、几社后劲,不免有袒护东林之处。”^[13]又如,徐秉义在卷十八《殉国传·夏允彝传》的评价中,其写道:

按允彝之《幸存录》,以东林、逆案并提,而较其铢两之劣优,置邪正于不道,所谓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也。温体仁、谢陞、杨维垣、张捷、王永光皆极力为之洗刷,三案之颠倒是非又不待言矣。今之邪说,必取证于是录,以允彝死节,其言当可信。岂知允彝所师者,齐人张廷登也。廷登故元诗教之密友。以廷登之是非为是非,焉得不谬。允彝本足千秋,多此一书,一资邪人之口舌,惜哉!^{[12]382-383}!

温体仁、谢陞、杨维垣、张捷、王永光均与东林不和,俱为东林所不与,杨维垣、张捷都是在清军攻陷南京时为国殉节,夏允彝在《幸存录》中为他们正名,徐氏认为夏允彝本可留足千秋,却因其写的《幸存录》记载了“阉党”之人的忠烈行为让人痛惜,由此可见徐秉义门户之见之激烈。

再者,我们推断,东林党一向标榜气节,以正人君子自居,而以东林党后裔自居的徐氏兄弟,在明朝灭亡之后却迅速投靠了清政府。清廷为了加强对江南的治理,有意笼络江南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昆山徐氏正逢其时,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三兄弟先后登第,其家族先后有不少的登第者,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于是,昆山徐氏“一跃成为东南望族”。反观被徐氏兄弟称之为“谄媚阉党”的张鹤鸣,在面对农民起义攻占颍州之时,主动参与颍州的防御工作,并在颍州陷落之后,宁死不降,备受荼毒而亡,颍州张氏一族坚守气节,数百人殉难,正如申用懋在张鹤鸣墓志铭中

写道:“时人谓啮齿穿龈似张睢阳,而公无守土之责;断舌骂贼如颜常山,而公多阊门之殉。一家之中,臣死忠,子死孝,妇女死节,天地之正气备矣。”^{[3]387}面对这种情形以徐氏兄弟为代表的部分东林党人定是不愿面对,也不愿承认张鹤鸣的忠义行为。

四、结论

有关张鹤鸣殉难的记载,兵科右给事林正亨在《详奏颍城忠节疏》中详细地介绍了颍州陷落的经过以及张鹤鸣殉难的过程,时任颍州太和县县令吴世济在《太和县御寇始末》中也有关于张鹤鸣殉难的记载,并捉住了杀害张鹤鸣的凶手,这些记载都与《司马公殉难事略》的记载相一致。吴世济作为太和县县令,是颍州陷落的亲历者;林正亨代表朝廷去勘察颍州陷落的经过,他们都证实了张鹤鸣积极参与颍州防御以及颍州陷落之后的殉亡是忠节行为,由此可见《司马公殉难事略》所言非虚。明末清初的吴伟业亦接受了晚明史籍对于此事的记述。

而在清代以邹漪、李逊之和徐秉义为代表的东林派史家却认为张鹤鸣因财身亡,毫无忠烈可言。尤其是徐氏的《明末忠烈纪实》总结了晚明以来对张鹤鸣殉难记载的各种观点,是张鹤鸣“因财丧身”观点的集大成者,其所用之史料是片面截取邹漪的《启禎野乘一集》中的文字,认为《绥寇纪略》所记载的张鹤鸣殉难并不可信,但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张鹤鸣殉难是因财丧身。之所以存在这种观点,是因为邹漪、李逊之、徐氏兄弟作为东林后裔,在修史时存有强烈的门户之见,认为一切与东林为敌者皆为“邪党”,既然是“邪党”那么其忠烈行为自然是不可信的。而张鹤鸣为官期间多与东林所不与,故东林派史家对张鹤鸣的忠烈行为采取了“道听途说”,片面截取文字的做法对其进行否定,将晚明党争的门户之见带入到修史之中,此或许也是晚明党争在清初修史中的延续。

参考文献:

- [1]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6619.
- [2] 吴世济. 太和县御寇始末[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45.
- [3] 张鹤鸣. 芦花湄集校注[M]. 张明华,朱玲芝,校注.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382.
- [4] 王敛福. 颍州府志:艺文志[M]. 合肥:黄山书社,2006:976-977.
- [5] 吴伟业. 绥寇纪略:卷三[M]. 李学颖,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69-70.
- [6] 王天民. 顺治颍州志校笺[M]. 张明华,郑斌,校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759-760.

- [7] 邹漪. 启祯野乘: 第一集[M]. 刻本. 无锡: 柳围草堂, 1644(明崇祯十一年).
- [8] 李逊之. 三朝野纪[M]. 活字印本. 武进: 李兆洛, 1824(清道光四年).
- [9] 李逊之. 崇祯朝记事[M]. 刻本. 武进: 盛氏, 1897(清光绪丁酉年).
- [10] 计六奇. 明季北略: 上, 卷十一[M]. 魏得良, 任道斌,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71-172.
- [11] 汪有典. 史外[M]. 刻本. 无为: 淡艳亭, 1749(清乾隆十四年).
- [12] 徐秉义. 明末忠烈纪实[M]. 张金庄, 校点.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 84-85.
- [13] 朱希祖. 明季史料题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83.

Evolution of Zhang Heming's Martyrdom Writing Since the Late Ming Dynasty

XU Lin, GAO Chenglong

(School of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Zhang Heming was highly controversial on the political stag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As far as his martyrdom is concerned, it is recorded in the late Ming historical book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artyrdom of Sima*, as well as in the writings of Lin Zhengheng and Wu Shiji and others that he defended the city Ying, and was executed when the city was broken, cursed the thieves and died, and was honored by the court.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Yingzhou* and the writings of Wu Weiye and Qu Dajun and others all inherited the late Ming historical records. But some historians of the Donglin school, represented by Zou Yi, Li Xunzhi and Xu Bingyi, believed that Zhang's martyrdom was due to financial loss of life an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historians of the Donglin school, represented by Xu Shi, brought the parochial prejudice of the late Ming party disputes into their history revision.

Keywords: Zhang Heming; Yingzhou; martyrdom; history writing; parochial prejudice

[责任编辑 夏强]